

# 论官僚政治对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影响

——读《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王 鹏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北京 100091)

【内容摘要】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以经济结构作为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切入点,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手法剖析中国的专制官僚政治形态。该书对官僚政治从技术性和社会性两方面进行定位,并且从政治形态、经济结构和文化意识三个维度来分析官僚政治对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影响及原因。《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对现阶段我国的官僚主义的克服和治理有着启示性意义。

【关键词】官僚政治 经济结构 官僚主义

中图分类号 D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0)06-0084-03

官僚政治是一个持久而复杂的话题。官僚主义作为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现象,对人类社会的危害沉重而又深远。王亚南先生深刻分析社会的发展态势,敏锐的洞察到官僚政治对中国社会的严重影响,并借偶碰“李约瑟难题”<sup>[1]</sup>之机,写成名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它是中国第一部研究传统官僚政治的作品,也是中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系统地剖析传统官僚政治的著作。王亚南先生以经济结构分析作为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切入点,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手法,剖析官民对立关系,既探讨了官僚政治的历史过程,又发掘了官僚政治的内在精神。

## 一、官僚政治的含义和性质

什么是官僚政治?王亚南首先援引英国政治学权威拉斯基的解释,拉斯基认为:“官僚政治一语,通常是应用在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上。那种政治制度的性质,惯把行政当作例行公事处理,谈不到机动,遇事拖延不决,不重实验。在极端场合,官僚且会变成世袭阶级,把一切政治措施,作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sup>[2](P1)</sup>王亚南基本同意这个解释,但是他对此又作了补充。他认为,拉斯基的定义着重是在技术层面上解释官僚政治,但如果把官僚政治当作一种社会体制来讨论,从社会的

意义上理解官僚政治的话,那么官僚政治就具有社会性。这就从技术性官僚主义和社会性官僚主义两个方面来分析官僚政治,既要看到官僚政治的技术性,又要重视官僚政治的体制内的社会性。由此出发,王亚南认为官僚政治的本质特征是:“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的自由,官僚把政府措施看作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sup>[2](P2)</sup>从这可以看出王亚南先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把问题从一个领域同时延伸到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尤其是社会史领域,并把它们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加以系统全面的考察。<sup>[1]</sup>在书的最后,王亚南又对官僚政治作了一个详细的定义:“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sup>[2](P174)</sup>

王亚南认为,作为社会体制内的典型的官僚政治,只存在于社会的某一个历史阶段。他得出结论,在欧洲,官僚政治存在于封建贵族政治转向资产者的民主政治的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就是专制主义政体。在专制主义社会中,封建贵族同工商资产者相互争权夺利,彼此不断斗争,在斗争的夹缝中,一些贵族逐渐转型为官僚,使政治权力不

\* 作者简介:王鹏(1983-)男,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政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断地把握在官僚手中,官僚的不断壮大,就必然的产生了官僚政治。因此,官僚是贵族的转型物,官僚政治是贵族与工商资产者争权夺利的配合物,是专制政治的副产物和补充物。从这一点上,王亚南不同意拉斯基关于“官僚政治是贵族政治的副产物”的观点,他认为官僚政治会随着专制主义政治的没落而丧失存在,官僚政治也自然成为一种过渡性的政治。在中国,官僚政治同欧洲官僚政治的本质不同。中国官僚政治的出现比欧洲要早的多,它不是一种过渡的形态,而是替代旧有封建贵族政治的又一种封建组织。相对于欧洲贵族越来越官僚化而言,中国则是官僚越来越贵族化。因此,中国是以贵族支配的封建社会瓦解后,代之而起的是一个以官僚支配的又一个封建社会,其本质还是一种封建形态。

## 二、官僚政治对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影响及原因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曾经提出这样的疑问：在第 1 至第 15 世纪，中国的科技发明和发展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可是，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论？欧洲在 16 世纪就产生了近代科学，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sup>[3][P1-2]</sup>这个疑问被学术界称为“李约瑟难题”。王亚南认为，破解这个难题仅仅从科学技术史来解释是远远不够的，这与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文化思想等因素都密切相关，而研究中国的官僚政治是破解这个迷团的关键性环节。在王亚南看来，中国科技落后问题映射着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问题，而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问题无非是中国典型的或特殊的封建组织的长期存续问题，这又与专制官僚政治形态保持极其密切的联系。因此中国特殊的官僚政治形态对中国社会长期停滞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深刻的原因。

王亚南用比较的手法对中国封建社会和西欧同时代进行了对比。王亚南首先指出：“在这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没有进步，只是它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上的改进速度过于缓慢，过于显得蹒跚不前；而其改进速度，且始终不会越出技术性的、量变的阶段，直到现在，还不能脱却半封建的状态。”<sup>[2]P119-120</sup>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主要是由于中国在初期封建体制的崩溃中，并不像西欧一样紧接着出现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半转型为一个立在地主经济基

基础上的集权的专制官僚的新型封建社会。

### 中国和西欧社会转型对比：

西周——→春秋战国——→清朝

中国：奴隶社会,类似于 → 地主经济为基础的 落后  
欧洲的领主封建体制 → 集权专制的官僚封建社会

西欧: 封建领主体制————→现代资本制的社会 进步

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可以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层次来解读：

在政治形态上，中国官僚封建社会从秦汉到清朝灭亡的两千多年中，各王朝虽然经过多次的更迭，但总是走改朝换代的老路，中国社会的政治形态没有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每次旧的王朝被推翻，出现的仍是换汤不换药的新的专制王朝，新的官僚系统亦粉墨登场，旧有的政治形态又随之复活。在此期间，官僚政治不断的对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层面进行整合，使之符合自身的利益，从而巩固其存续的基础。

从经济角度分析,王亚南尖锐指出,封建的专制官僚统治是把统治者官绅与被统治者农民结成的社会经济关系作为其社会存在基础的限内,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始终不能够突破其生产关系的水准。中国的封建制经历了领主经济和地主经济两个阶段,自秦朝到清朝的两千多年间,地主经济一直占有支配地位,其基本结构要素是农工结合体。中国王朝虽然经历了数次的更迭,但每次的更新换代都不仅没有对中国基本的经济结构形态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革,相反,每次的政治变动都在设法加强这种结构的顽强性。因此中国的地主经济始终未能在其胚胎内孕育出以个人私有财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 and 生产关系。这也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深层原因。

从文化意识上分析,以“天道观念”、“大一统观念”和“纲常教义”为内容的“三位一体”的儒家学说是“最便于专制”的儒术。这成为配合官僚政治和地主经济的支配意识形态,是维护封建官僚政治所缺一不可的。虽然儒学的演变在长期的专制官僚统治过程中有不同的姿态,每到一个新阶段,都会有新的思想,但本质仍是“儒学”,万变不离其宗。同时,官僚政治的包容性和贯彻性使得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儒术、伦理、宗法、艺术等都与封建官僚政治密切的联系在一起。这些文化作用都限于封建官僚政治的体制之内,成为官僚制度内部的一个机能,这种官僚政治的价值观念深深的嵌入了民族的文化和心理之中。正是这种思想

的麻醉减弱了民众的反抗力，也使中国的官僚政治虽在倾覆之中，也常可得苟延残喘。<sup>[4]</sup>

总结起来，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是“同构”的，它们紧紧扭结在一起，成为“三位一体”的“混合物”。封建地主经济的支配地位，中国传统思想儒家学说的独占性，与专制主义官僚政治的独裁色彩三位合一，共同阻碍着中国社会的根本性长期发展。就像王亚南所说：“中国社会之所以长期停滞在地主经济的封建阶段，就因为在这种经济形态本身，已经存在着一些使它不易在胎内好好孕育出新生产方式的限制，而以这种经济形态为基础的官僚政治组织和儒家学说，更从中作了许多缓和矛盾对立的措施。”<sup>[5](P94)</sup>

### 三、小结

王亚南在文章的最后提到了中国官僚政治的前途问题，他认为现阶段官僚政治愈来愈不易存在，新的人民的时代正在加速成长形成，官僚政治将被消灭。王亚南过于乐观地回答了官僚政治的前途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直到今天，官僚政治的表现仍然存在，政治、经济、社会中的“官本位”现象随处可见。只是社会主义下的官僚主义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了本质的不同，但现阶段我们仍然需要研究如何同官僚主义做斗争，如何克服和避免官僚政治的种种恶习。改革开放后中共两代领导人都重点强调了官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早在1980年对官僚主义就有深刻的论述。他指出：“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

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sup>[6](P32-328)</sup>江泽民同志也曾指出：“官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官本位’意识。”<sup>[7](P653)</sup>

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对于克服和避免现阶段的官僚主义作风有着启示性意义。他对官僚政治定位时认为官僚政治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在整个社会的体制上来看，它更突出的显现社会性。因此要从技术性官僚主义和社会性官僚主义两方面来分析官僚政治。王亚南的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给了我们治理官僚主义的方向，即现阶段治理官僚主义不仅要从技术层面上入手，更重要的是从社会制度的层面来治理，进行制度改革，从根本上根治官僚主义。

参考文献：

- [1] 张兴国，张兴祥.“李约瑟难题”与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J].广东社会科学，2003(2):121.
- [2]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3]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 [4] 张继文.半个世纪前的洞见——读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J].领导之友，2003：48.
- [5] 王亚南.地主经济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M].王亚南文集(第四卷)[A].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
- [6]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7]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